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下〉

The Choice of Strategy Towards One's Strong Neighbor: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II)

doi:10.30390/ISC.199703_36(3).0003

問題與研究, 36(3), 1997

Issues & Studies, 36(3), 1997

作者/Author : 吳玉山(Yu-Shan Wu)

頁數/Page : 61-8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97/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3_36\(3\).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3_36(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抗衡或扈從： 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下）

吳玉山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肆、抗衡抑扈從：十四共和國的對俄政策

三、外高加索

位於外高加索的喬治亞、亞賽拜然和亞美尼亞三國是前蘇聯的第三組共和國。它們就經濟狀況來說原本低於第二組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多瓦，但是勝於中亞五國。然而後來因為連年戰亂，所以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已經落到十四個共和國當中的最低水平。在蘇聯解體的時候，外高加索的國家也躍躍地爭取獨立的地位，並且極力對抗莫斯科的影響。但是獨立後政治經濟的難局逐漸迫使這些國家向俄羅斯靠攏，結果又走到扈從的道路上來。從總體的角度來看，外高加索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與它們和西方世界的隔閡形成了這些國家對俄政策的自然約制。在突破這些約制的企圖失敗了之後，三國只有調整本身對莫斯科的態度。

（一）喬治亞

在外高加索三國當中，喬治亞對俄政策的轉折最為清楚，幅度也最大。在蘇聯時代，喬治亞是一個相當有發展潛力的共和國，它的人均 GDP 僅次於哈薩克和亞美尼亞，在南方的八個共和國當中居於第三位。[◎]尤其在謝瓦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長期擔任喬治亞共黨第一書記的時期（1972～1985），喬治亞的地下經濟和私營企業蓬勃發展，在蘇聯各共和國當中獨樹一幟。[◎]喬治亞因為有長期的抗俄傳統，在經濟上又展現了相當的活力，早已背離了蘇聯的計畫體制，所以當莫斯科的權威逐漸解體的時候，提比里斯（Tbilisi）便出現了強烈要求獨立的呼聲。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共黨部隊鎮壓提比里斯的示威抗議群眾，死者約二十人，於是舉國嘩然，繼謝瓦納澤擔任第一書記的巴提亞什維里（Dzhumber Patiashvili）因而去職，而民憤仍未消。[◎]

註◎ 參見本文上篇表二。

註◎ 參見 *EIU Country Profile : Georgia , Armenia , Azerbaijan , 1995~1996* , p. 14.

註◎ Sharon Fisher, “Former Communists : Where Are They Now ? ” *Transition* , Vol. 2, No. 12 (June 14, 1996) , p. 28.

在次年十月的國會大選當中，代表民族主義力量的「圓桌－自由喬治亞聯盟」(The Round Table-Free Georgia Coalition)大勝，推出其領袖岡薩胡吉亞(Zviad Gamsakhurdia)為國會主席。[◎]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喬治亞就獨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結果獨立案獲得九成以上民眾的支持，而提比里斯便在「四月屠殺」的兩週年紀念日宣布從蘇聯獨立。這個宣布獨立的日期在所有前蘇聯共和國當中僅遲於波羅的海的立陶宛(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和愛沙尼亞(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而早於其他十二個共和國，由此可見喬治亞民族主義之盛。

岡薩胡吉亞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獲選為喬治亞的第一任民選總統。他對外採取抗衡莫斯科的政策，對內則以強硬手段壓制異己，導致民怨沸騰，最後在一九九二年一月被國防部長科托瓦尼(Tengiz Kitovani)和軍事領袖伊昂塞利安尼(Dzhaba Ioseliani)所聯合放逐。科、伊二人接著在三月迎請前共黨書記及在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一年間擔任蘇聯外長的謝瓦納澤回國，擔任過渡時期國務委員會的主席，希望能夠利用他的國際地位為喬治亞爭取外國的援助。到了十月國會改選之時，謝瓦納澤又被選為國會議長，並擔任國家元首的職務。這個時候提比里斯仍然是對俄採取強硬的抗衡策略。

由於喬治亞不加入獨立國協，又不和莫斯科積極改善關係，它在一九九二年所遭受的經濟打擊特別嚴重。當年GDP下跌了四四·八%，而通貨膨脹率則高達一、四六三%。[◎]尤有甚者，喬治亞西部阿布哈吉亞(Abkhazia)的分離運動益趨嚴重，並且獲得了俄羅斯軍方的支持。在一九九三年八月，阿布哈吉亞的叛軍攻陷了首府蘇扈米(Sukhumi)，迫使二十五萬的喬治亞人逃離家園，而前總統岡薩胡吉亞的支持者又對政府軍發動攻擊。當時謝瓦納澤內外交困，經濟危機、軍事挫敗和外交孤立紛至沓來，新政權隨時有傾覆的可能。

謝瓦納澤看出來喬治亞在政治、經濟和外交方面的困局都導源於提比里斯對於莫斯科不妥協的態度，所以在一九九三年底他開始轉變喬治亞的對俄政策。在一九九四年二月謝瓦納澤邀請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訪問提比里斯，雙方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謝瓦納澤又改變了喬治亞不參加獨立國協的僵硬立場，而敦促國會在一九九四年三月通過了入會案。謝瓦納澤同時允諾俄羅斯可以在喬治亞維持駐軍，並保有三處軍事基地。[◎]結果莫斯科在滿意之餘，開始對阿布哈吉亞施加壓力，促成了五月十四日的停火協定，多年來的軍事衝突終告緩和。

在和俄羅斯取得協議之後，喬治亞的局勢迅速穩定下來。阿布哈吉亞雖然仍然企求獨立，甚至表示願意加入俄羅斯聯邦，並獲得莫斯科一些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但是

^{註◎} 參見龍舒甲，「格魯吉亞的政局發展：民主選舉與民族衝突」，《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五期，民國八十五年五月，頁六五。

^{註◎} 參見表五及 Michael Wyzan, "The Economy Heads Upward: Interview with David Onoprishvili," *Transition*, Vol. 2, No. 12 (June 14, 1996), p. 44.

^{註◎} Elizabeth Fuller, "Between Anarchy and Despotism," *Transition: 1994 in Review, Part II* (February 1995), pp. 60~65.

葉爾欽的政策已經轉向維持喬治亞的領土完整。^⑩俄羅斯在車臣所面對的分離運動挑戰更加深了莫斯科對阿布哈吉亞獨立運動的反感。^⑪在喬治亞另外一個分離主義運動勢力甚大的南奧賽西亞（South Ossetia），情況亦復如是。^⑫軍事行動停息了之後，謝瓦那澤開始引進新的經濟改革班子，並且從一九九四年九月起推動全面性的價格改革、縮減政府人員編制、緊縮央行貨幣供給、力求穩定經濟局面。由於穩定化進行順利，IMF 和世界銀行開始同意提供各項貸款，充裕了提比里斯政府的財政資源。^⑬到了一九九五年六月政府開始推動大眾私有化（mass privatization）的政策，在十月又發行了新貨幣拉里（lari），以結束過去代用券（coupon）、盧布和美金通用的混亂現象。各種改革大力推動的結果，喬治亞的經濟大有起色。在一九九五年通貨膨脹率從一年前的七、三八〇% 下降到六〇%，政府預算占 GDP 的比重從二〇% 降到六%，對美金的匯率從一三〇萬代用券對一美元穩定到一·一七拉里對一美元。^⑭由於經濟逐漸穩定，外資也開始進入。亞賽拜然國際營運公司（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Operating Company, AIOC）決定在巴庫（Baku）到喬治亞的黑海港口巴圖米（Batumi）之間修築油管，以輸出亞賽拜然石油，此事更鼓舞了喬治亞全國。在對外貿易方面，喬治亞恢復了對俄羅斯的出口（在一九九四年占總額的五〇%），^⑮同時和土庫曼達成協議，保持天然氣的繼續輸入。^⑯在一九九六年年初小型企業的私有化已經達成了八九%，而國會也在二月正式通過了政府預算。金融改革、破產法和自由貿易區也都逐一實行，IMF 甚至估計一九九六年的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八%，喬治亞的經濟可謂已經從谷底翻升。^⑰在此種經濟情況之下，謝瓦那澤進一步尋求鞏固自己的權力。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喬治亞實行了新憲法。到了十一月，謝瓦那澤以七四% 的高票當選為總統，^⑱他所領導的喬治亞公民聯盟（The Union of Citizens of Georgia）

註⑩ 在俄羅斯的壓力之下，阿布哈吉亞仍然堅持追求獨立。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阿布哈吉亞的國會通過新憲法，並選舉阿爾津巴（Vladislav Ardzinba）為總統。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阿布哈吉亞又舉行國會大選。這些選舉都是在於一九九三年逃離阿布哈吉亞的二十五萬喬治亞人尚未返回家園的情形下舉行的。不過雖然阿布哈吉亞追求獨立的意志堅決，但是莫斯科已經對喬治亞的分離運動轉變立場。參見 Elizabeth Fuller, “When Should Unrecognized States Hold Elections?” *OMRI Analytical Brief* (on Internet), Vol. 1, No. 498 (November 27, 1996).

註⑪ 參見 Gerald Robbins, “Oil and Subterfuge Mix,” *Freedom Review*, Vol. 26, No. 6 (November/December 95), pp. 43~45.

註⑫ Gina Ganzero, “Who’s Who in the Republic,” *Europe*, No. 333 (February 1994), pp. 16~19.

註⑬ 參見 Irakli Tsereteli, “Seeking Stability Under Shevardnadze,” *Transition*, Vol. 2, No. 15 (July 26, 1996), p. 44.

註⑭ 參見本文上篇表六。

註⑮ *EIU Country Profile: Georgia, Armenia, Azerbaijan, 1995~1996*, p. 27.

註⑯ 在喬治亞十億美金的債務當中，大部分（約四億）是積欠土庫曼的天然氣費用。因為喬治亞繳納不出這筆款項，土庫曼曾經在一九九四年一度中止天然氣的供應。

註⑰ *The Economist*, June 15, 1996, pp. 49~50.

註⑱ 謝瓦那澤在八月二十九日前往簽署新憲法的時候，受到汽車炸彈的攻擊。謝瓦那澤倖免於難。這個事件反而有助於他的總統競選。

也在二二五席的國會當中囊括了一〇六席，成為主導勢力。^⑩

喬治亞的例子充分顯示出和莫斯科維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從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喬治亞的經濟衰退在全蘇聯十五個共和國當中最嚴重的，再加上分離主義盛行、前任總統岡薩胡吉亞試圖以軍事力量復辟、提比里斯又和獨立國協隔絕，整個國家瀕臨了解體的邊緣。然而由於謝瓦那澤向現實低頭，將喬治亞對俄羅斯的政策取向由抗衡轉成扈從，結果分離主義失去國外支持、岡薩胡吉亞復辟的企圖失敗、喬治亞和獨協國家的關係恢復，經濟改革也才有實行的機會。時至一九九六年，提比里斯的領導階層已經體認到，以喬治亞的政治和地緣環境，註定要做俄羅斯的戰略夥伴。^⑪

(二)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對俄政策的轉折不像喬治亞那麼明顯，原因是與亞賽拜然之間的戰爭。自從戈巴契夫推動政治改革之後，亞美尼亞就產生了強烈的民族主義運動。然而這個運動的對象主要不是莫斯科，而是鄰國的亞賽拜然。二亞之間的爭議焦點是位於亞賽拜然境內的納戈羅－卡拉巴赫自治州（Nagorno-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此地的居民七五%是亞美尼亞人，他們希望和母國統一。^⑫然而納卡州位於亞賽拜然國土當中，巴庫勢不能讓。於是兩國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武裝衝突，成為蘇聯民族危機的導火線。

莫斯科在納卡領土爭議當中雖然情緒上支持同為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但是又不能不主張維持亞賽拜然的領土完整，結果同時為葉里溫（Yerevan）和巴庫所不滿。在一九八八年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高漲，成立了卡拉巴赫委員會，全力爭取納戈羅－卡拉巴赫回歸祖國。到了一九九〇年五月國會舉行大選，民族主義黨派獲得大勝，「亞美尼亞泛民族運動」（Armenian Pan-National Movement）的傑彼得森（Levon Ter-Petrosian）並在八月當選為國會主席。一年後蘇聯政變，納戈羅－卡拉巴赫迅速成立共和國，而亞美尼亞也在八月二十三日宣布獨立。在十月間亞美尼亞舉行總統大選，傑彼得森以八三%的高票當選。^⑬到此為止，亞美尼亞和一般急於尋求從蘇聯獨立的少數民族共和國並沒有不同。

亞美尼亞想要脫離莫斯科的控制具有一個獨特的優勢。除了在蘇聯之外，散居全球的亞美尼亞人總共有一百四十萬，其中在美國就有四十五萬，而且其中不乏政治和

註^⑩ 當時前共黨領袖巴提亞什維里只獲得了十七%的選票，相當反映出謝瓦那澤受到民衆支持的程度。

參見 Irakli Tsereteli, "Seeking Stability Under Shevardnadze," p. 42.

註^⑪ *Rossiskaya gazeta*, May 16, 1996.

註^⑫ 在一九八九年亞美尼亞的人口有三百三十萬人，其中本族人占了九四%，這是蘇聯所有共和國當中種族最單純的。然而在亞美尼亞周圍的國家當中卻居住了大批的亞美尼亞人，其中在亞賽拜然就有八十萬。境外亞美尼亞人一直是鄰國和亞美尼亞的爭執焦點。納卡州的爭議是其中之一，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是另一個例子。

註^⑬ 參見龍舒甲，「亞美尼亞的政經發展」，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十一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頁八五。

文化界的菁英，這個現象在各個前蘇聯共和國當中是絕無僅有的。當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亞美尼亞發生大地震之後，從西方來的捐款就源源不絕。此一有利的條件，使得葉里溫有可能尋求西方的奧援，來對抗莫斯科的壓力。

然而納戈羅－卡拉巴赫的戰事卻對亞美尼亞產生了更重大的影響。由於亞賽拜然在文化上與種族上和亞美尼亞的世仇土耳其相近，安卡拉（Ankara）遂對巴庫給予充分支持，並偕同亞賽拜然對亞美尼亞展開了封鎖。^⑩大地震的損失、納卡戰事的持續、蘇聯貿易網崩解的影響、經濟轉型的壓力以及封鎖的效果，使得亞美尼亞的GDP在一九九二與一九九三年分別減少了五二·三%和一四·八%，通貨膨脹率則上升了八二五%與三、七三二%。亞美尼亞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所發行的新貨幣專姆（dram）匯率也不穩定。此際從西方來的支助畢竟杯水車薪，亞美尼亞唯一有效的援助只可能來自莫斯科。^⑪

在此種狀況之下，傑彼得森採取了向莫斯科一邊倒的路線。俄羅斯和亞美尼亞早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就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次年又簽訂集體安全條約，以及俄軍駐防協定。到了一九九五年三月，亞美尼亞又給予俄羅斯使用境內 Gyumri 軍事基地二十五年的權利，兩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已經到達了結盟的地步。^⑫亞美尼亞更是獨立國協的標準會員國，對各項由俄羅斯所推動的合作計畫積極參與。相對於亞美尼亞的合作，俄羅斯則不斷地將其援助物資透過喬治亞運送到亞美尼亞，供應能源燃料和各種原料，並且幫助亞美尼亞修復了梅扎摩（Medzamor）核能電廠。^⑬這些支援幫助亞美尼亞渡過了獨立後最困難的時期。此外，在納戈羅－卡拉巴赫的爭議上，莫斯科主導了和談的進行，^⑭並且在一九九四年促成雙方達成了停火協定。此一停火協定創造了較為安定的政治環境，並且為經濟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亞美尼亞雖然受到各種條件的約束，但是仍大膽地推動激進的經濟改革。它的價格改革在獨立之前就已經開始，到了一九九二年底農地的私有化已經完成。不過真正

註⑩ 龍舒甲，「亞美尼亞的政經發展」，頁九〇。

註⑪ 美國每年大約給與亞美尼亞一億美金的經援，以人均數來說，亞美尼亞所接受的美援是非常高的。參見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1, 1996, pp. 52~53.

註⑫ Elizabeth Fuller, "Transcaucasus — Doomed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Transition*, Vol. 2, No. 23 (November 15, 1996), pp. 29~30.

註⑬ 梅扎摩核電廠所採用的是 VVER 440/270型反應器，和車諾比的 RBMK 型相似。梅扎摩電廠距離首都葉里溫只有二十五公里，距離一九九八年大地震的震央也只有九十公里，這樣的環境顯然帶有極高的危險性，因此該電廠在一九八九年被關閉。然而為了改善每日僅有二小時有電可用的窘迫狀況，葉里溫政府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藉由俄羅斯的幫助，將梅扎摩的發電機組重新啓動。參見 Peter Nastmyth, "A Disaster Waiting to Happen,"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96, No. 8 (August 1996), p. 10；及 Astghik Vardanian, "Armenia's Choic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2, No. 4 (July/August 1996), pp. 50~54.

註⑭ 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歐洲安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同意將其對於納戈羅－卡拉巴赫爭議的調停和俄羅斯的調停合併，事實上等於是在納卡問題上認可莫斯科的優越地位。參見 Elizabeth Fuller, "Between Anarchy and Despotism," p. 60.

大規模的經濟改革還是在納戈羅－卡拉巴赫停戰協定達成之後才開始展開。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亞美尼亞將經改更進一步，廢除了國家對企業的補助，並且以它的改革措施在十二月爭取到了IMF的貸款。次年更推出公司法、銀行法、破產法、反壟斷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步驟。結果亞美尼亞的GDP在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五年分別成長了五·四%和五%，在各個前蘇聯共和國當中一枝獨秀。由於經濟表現傑出，傑彼得森所領導的「共和政團」在一九九五年七月的國會選舉當中獲得勝利，而傑彼得森本人也在一九九六年九月的總統大選當中以五一·七五%的票數再度當選。對於亞美尼亞人民而言，選擇傑彼得森就是選擇他的親俄政策。在亞賽拜然和土耳其的包夾之下，亞美尼亞人普遍認為俄羅斯是他們的最佳夥伴，並且主張和莫斯科結盟，對於北約則評價不高。^⑩葉里溫因此成為俄羅斯在外高加索的最忠實的扈從者。

(三)亞賽拜然

亞賽拜然在種族和語言上接近土耳其，但是在宗教上卻和伊朗一樣是什葉教派。它的經濟開發程度和土庫曼與吉爾吉斯等中亞國家相似，卻明顯地落於亞美尼亞和喬治亞之後。總體說來，亞賽拜然在經、社與文化條件上其實比較接近中亞，^⑪並且和西方相當疏離。在這種結構之下，巴庫對於莫斯科基本上應該會採取中亞式的扈從政策。

然而在外高加索三國當中，亞賽拜然的對俄政策卻波折最多，原因是納戈羅－卡拉巴赫的爭端。由於反對共黨政府在納卡問題上的軟弱立場，一群亞賽拜然的知識分子在一九八九年七月成立了亞賽拜然人民陣線（Azerbaijan Popular Front, AKhJ），以埃爾齊拜（Abulfaz Elchibey）為主席。人民陣線非常反感莫斯科在態度上偏向亞美尼亞，所以對維茲羅夫（Abdul Rakhman Vezirov）所領導的共黨政權大肆抨擊，結果在一九九〇年一月引來蘇聯紅軍的嚴厲鎮壓，人民的死傷（死亡一百二十四人）尤甚於一九八九年在喬治亞的「四月屠殺」。民怨沸騰的結果，在九月的國會選舉當中，人民陣線獲得選民的支持，掌握了多數席次。雖然如此，由於亞賽拜然的民族主義力量有限，所以接任維茲羅夫擔任共黨第一書記的穆塔里波夫（Ayaz Mutalibov）仍然能夠在一九九一年九月的總統選舉當中獲勝，並且在獨立後維持和莫斯科的友好關係。

在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和哈薩克總統納扎巴耶夫的調停之下，納卡爭端本來有可能在一九九二年年初解決，但是由於亞賽拜然認為亞美尼亞蓄意武裝挑釁，所以在一月宣布取消納卡州的自治地位。^⑫這個決定導致戰火擴大，亞賽拜然方面受到重創，在

^{註⑩} 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的一次民意調查當中，只有一二%的受訪者認為北約能夠對亞美尼亞提供俄羅斯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參見 *Nezavisimaya gazeta*, May 24, 1996.

^{註⑪} 參見 Shireen Hunter, “Azerbaijan: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New Partners,”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5.

^{註⑫} 參見龍舒甲，「阿塞拜疆的政局發展：變遷與衝突」，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三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三年八月，頁七六。

霍亞力（Khojali）和阿格丹（Agdarn）的村民也被亞美尼亞軍隊屠殺。面對戰局逆轉，人民陣線在三月發動武裝抗爭，占領總統府，迫使穆塔里波夫下台。到了六月，人民陣線的埃爾齊拜被選為總統，設置新的議會（Milli Majlis），開始政策的全盤轉向。首先在外交路線上疏離俄羅斯，而和土耳其親善；反對加入獨立國協，拒絕俄軍在亞賽拜然駐防。在經濟上脫離盧布區，發行新貨幣（manat）。甚至廢除俄羅斯所使用的錫瑞爾字母，而像土耳其一樣用拉丁字母拼寫本國語言。^⑩巴庫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一時跌到谷底。

埃爾齊拜的民族主義統治導致民窮財盡，納卡戰事又接連失利，結果不過維持了一年便又被親俄派的前共黨第一書記阿里耶夫（Heidar Aliev）所取代。埃爾齊拜所領導的亞賽拜然和岡薩胡吉亞統治下的喬治亞有許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民族主義政權，並且激烈地反對莫斯科。二者都不願意加入獨立國協，或和獨協國家維持緊密的關係。由於經濟的危機，加上國內戰事的影響（在喬治亞是阿布哈吉亞的分離運動，在亞賽拜然是納卡戰爭），二者的統治都很短暫，並且都被從莫斯科回來的前共黨大員所取代。在喬治亞，前共黨第一書記和蘇聯外長謝瓦那澤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回國收拾岡薩胡吉亞的殘局；在亞賽拜然，前共黨第一書記（1969～1982）和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1982～1987）阿里耶夫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從故鄉納希切萬（Nakhichevan）回到巴庫，^⑪收拾胡賽諾夫上校（Surez Huseinov）政變，埃爾齊拜總統出亡後的殘局。^⑫兩個外高加索國家在獨立後的發展證實了在一定的經、社和國際環境之下，前蘇聯共和國對莫斯科的態度是受到相當制約的。

阿里耶夫回到巴庫後，先是被選為國會主席，然後他在八月主導了一個公民投票，展示民眾對於埃爾齊拜的不信任，最後在十月三日的總統選舉當中，阿里耶夫以九八·八%的高票當選。在鞏固了本身的政權後，^⑬阿里耶夫將埃爾齊拜抗衡莫斯科的政策全面轉向。於是亞賽拜然在九月二十一日加入獨立國協，並且歡迎俄羅斯與歐安會議調停納卡衝突。巴庫方面更願意透過莫斯科的中介，和納卡領袖直接談判。^⑭由

註^⑩ EIU Country Profile : Georgia , Armenia , Azerbaijan , 1995~1996 , p. 54.

註^⑪ 阿里耶夫在一九九〇年從莫斯科回到故鄉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這是一個位於亞美尼亞境內，但卻由亞賽拜然所管轄的地區。在一九九一年他當選為納希切萬議會的主席，積極和土耳其與伊朗改善關係，並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創立新亞賽拜然黨（Yeni Azerbaijan）。參見 Elizabeth Fuller, “Between Neo-Stali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Transition* , Vol. 2, No. 18 (September 6, 1996) , p. 35.

註^⑫ 胡賽諾夫的政變顯然獲得了莫斯科的支持。當時亞賽拜然就要和西方的石油公司簽訂一個規模龐大的開採合約，但是俄羅斯卻被排斥在外。這個經濟上的衝突，加上長期以來莫斯科和巴庫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得克里姆林宮必欲除埃爾齊拜而後快。參見 Elizabeth Fuller, “Transcaucasus — Doomed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p. 31.

註^⑬ 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和十月，阿里耶夫指控內政部副部長賈瓦多夫（Rovshan Djavadov）和總理胡賽諾夫陰謀發動政變。接著阿里耶夫就大肆整肅，以去除前總統穆塔里波夫和埃爾齊拜的政治勢力。結果阿里耶夫任用了大批他的親族和家鄉納希切萬的人士充任要職。

註^⑭ 參見龍舒甲，「阿塞拜疆的政局發展：變遷與衝突」，頁七七。

於這個態度的轉變，亞賽拜然和亞美尼亞終於在一九九四年五月經由俄羅斯的調停，達成停火協定。雖然由於亞賽拜然不願意接受由獨立國協或俄羅斯派遣維持和平部隊進駐納卡地區，因而使得納卡爭端仍然懸而未決，但是武裝衝突已經平息，兩國終於獲得和平發展的機會。

阿里耶夫的現實路線雖然替亞賽拜然解決了眼前的困局，但是他並沒有像亞美尼亞的傑彼得森一樣充分地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來推動經濟改革。問題的癥結在亞賽拜然豐沛的石油蘊藏。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亞賽拜然和以英、美大石油公司為主所組成的亞賽拜然國際營運公司（Azerbaijan International Operating Company, AIOC）簽約，合作開發三處裏海油田。[◎]這裡的石油蘊藏量高達三十億桶，預計可以為亞賽拜然在未來的三十年當中帶來一千億美金的收入。擁有這樣可觀的天然資源似乎表示巴庫不需要推動痛苦的經濟改革，只要石油開採出來，亞賽拜然的一切經濟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於是從穆塔里波夫到阿里耶夫，歷任的總統都不急於接受 IMF 的條件來推動經改。然而由於俄羅斯堅決反對用 AIOC 的方式開採裏海的石油，而主張裏海的一切天然資源要由裏海的沿岸國家共同決定，所以為 AIOC 案投下變數。[◎]另一方面，由於 AIOC 決定大部分的石油要由巴庫到喬治亞的巴圖米之間的管線運輸，而不是經由現有的管線從車臣和俄羅斯運送出去，所以莫斯科反對得更厲害，甚至不惜封鎖邊境，以示抗議。一九九五年四月亞賽拜然在美國的壓力之下，決定不售予伊朗本身所有的 AIOC 五% 的股份，又導致伊朗的經濟報復。所以裏海石油國際開發案對亞賽拜然而言，是未蒙其利，反先受其害。

由於經濟改革遲滯，AIOC 又進度緩慢，所以亞賽拜然的經濟表現在納卡停戰後並沒有明顯地改善。一九九四年亞賽拜然的經濟萎縮了八%，通貨膨脹更高達一、六六四%。於是一九九五年阿里耶夫終於同意接受 IMF 的經濟改革方案，一方面抽緊銀根，減少政府開支，一方面放開價格，減少管制。結果物價上漲雖然受到抑制，通貨膨脹率在一九九五年下降到每月一·五%，但是強烈的緊縮政策使得經濟更加萎縮，在一九九五年下降了十到十五個百分點。像中亞的土庫曼一樣，亞賽拜然由於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而延緩經濟改革的結果，只是會使得經改的痛苦延後出現。因此當喬治亞和亞美尼亞的經濟已經開始復甦的時候，亞賽拜然才開始進入經改初期最痛苦的

註[◎] AIOC 由以下的十二家石油公司投資組成：美國的 Amoco, Exxon, McDermott International, Pennzoil, Unocal, 英國的 British Petroleum, Ramco, 挪威的 Statoil, 土耳其的 TPOA, 沙烏地的 DNKL Oil, 俄羅斯的 Lukoil, 和亞賽拜然的國營石油公司 SOCAR。預計開發亞賽拜然三處裏海油田：Azeri, Chirag, 和 Guneshli。這是對前蘇聯國家最大的投資案。EIU *Country Profile: Georgia, Armenia, Azerbaijan*, 1995~1996, p. 57.

註[◎] EIU *Country Profile: Georgia, Armenia, Azerbaijan*, 1995~1996, p. 56.

註[◎] 亞賽拜然已經讓俄羅斯的國家石油公司 Lukoil 占有一〇%的股份，但是莫斯科仍不滿意。這裡顯現出來的是俄國各個官僚體系之間對外高加索政策的不一致。在裡海石油開發案上，軍方的態度最強硬，外交部次之，而能源部門著眼於取得部分的石油供應，所以願意接受 Lukoil 取得 AIOC 一〇% 股份的條件。參見 Stephen Blank, "Energy and Security in Transcauca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42, No. 4 (July/August 1995), pp. 13~17.

階段。

由於經濟持續凋敝，納卡的局勢繼續僵持，西方的支持又十分有限，阿里耶夫對莫斯科只能採取親善的態度。不過有鑑於俄羅斯在納卡爭端當中左袒亞美尼亞，所以巴庫堅決反對俄軍在納卡地區執行維和任務，也反對俄軍駐防亞賽拜然的南方邊界。從這些地方來看，巴庫和莫斯科的關係在外高加索三國當中最為疏遠的。然而亞賽拜然基本上還是尊重俄羅斯的優勢地位，並沒有挾外力抗衡的企圖。¹⁰民族主義的政策在埃爾齊拜的時代已經被證明是不可行的，而阿里耶夫深切地了解到和莫斯科維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

四、摩多瓦、烏克蘭與白俄羅斯

現在我們將進入西部三國——摩多瓦、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討論。西部三國和外高加索一樣，在經濟發展程度和西方的接受度兩方面都是居中，既不若波海三國有抗衡俄羅斯的條件，也不像中亞五國那樣只可能選擇扈從。摩多瓦、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在獨立之初都有相當激昂的民族主義，對莫斯科多所抗爭。但是在嘗受了對抗的代價之後，在一九九四年伴隨著領導階層的轉變，三國都逐漸轉變了它們的對俄政策，不過在程度上還是有相當大的不同。其中白俄羅斯希望和俄羅斯復合，摩多瓦採取的是一般的扈從策略，而烏克蘭則在配合莫斯科之際仍然希望能夠維持相當獨立的地位。

(一) 摩多瓦

摩多瓦史稱比薩拉比亞 (Bassarabia)，當地的居民是羅馬尼亞裔。在十九世紀的時候這塊領土在俄羅斯和羅馬尼亞之間轉移了好幾次，成為兩國間爭執的焦點。¹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比薩拉比亞歸於羅馬尼亞，但是在一九四〇年又被蘇聯興兵占領，成立了摩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Moldav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並且移入了大量的俄羅斯與烏克蘭裔的人口。在一九九〇年，當摩達維亞民族主義興起的時候，德涅斯特河左岸的俄裔與烏克蘭裔宣布成立了外德涅斯特共和國 (Transdnestria)，¹²從摩多瓦 (摩達維亞的新名) 獨立，並且受到莫斯科派駐當地的第十四軍的卵翼。在一九九二年外德涅斯特和摩多瓦相戰，對摩多瓦的經濟損害很大。俄國的杜馬國會為了表示對於外德涅斯特的支持，甚至邀請其總統史米爾諾夫 (Igor Smirnov) 到國會演說，並且公開宣稱外德涅斯特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¹³凡此

^{註10} 阿里耶夫在一九九四年二月訪問土耳其，修好和安卡拉的關係，並簽訂了十年友好條約。和伊朗關係方面，阿里耶夫極力拓展貿易，使得伊朗成為亞賽拜然在前蘇聯各國之外最大的貿易夥伴。然而阿里耶夫摒棄了埃爾齊拜一面倒的親土政策；他又對德黑蘭所支持的什葉派活動惴惴不安，並在一九九六年四、五月間逮捕亞賽拜然回教黨 (Islamic Party of Azerbaijan) 的領袖。

^{註11} 比薩拉比亞原為土耳其屬地，在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和約當中歸於俄羅斯。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戰爭俄國失敗後，在巴黎條約中比薩拉比亞又割歸摩達維亞。接下來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俄土戰爭當中俄羅斯獲勝，於是又在聖斯泰法諾條約 (Treaty of San Stefano) 當中收回比薩拉比亞。

^{註12} 在外德涅斯特地區，俄羅斯裔佔了總人口的二五%，而烏克蘭裔佔了二八%。

^{註13} *The Economist*, October 5, 1996, pp. 51~52.

種種均說明莫斯科和戚西諾(Chisinau)之間有深刻的歷史仇恨和重大的利益衝突。^⑭

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摩多瓦很自然地出現了主張民族主義和對抗莫斯科的政治勢力，它們初期是團聚在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周圍，後來又形成了農民與知識分子政團(Peasants' and Intellectuals' Bloc, BTI)，和基督教民主人民陣線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Popular Front Alliance, AFPCD)。與它們相抗的是主張對俄親善的民主農民黨(Democratic Agrarian Party，即前共黨)與社會黨(Socialist Party/Yedinstvo)。在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三年獨立初期，民族主義當道，雖然總統斯內古(Mircea Snegur)主張較溫和的政策，但是在國會主導之下，戚西諾對莫斯科採取對抗的態度，並且渴望與母國羅馬尼亞合併。在一九九三年九月，國會拒絕加入獨立國協，結果親俄的民主農民黨等杯葛議事運作，國會因而為之癱瘓。

摩多瓦獨立初期的民族主義政策帶來了重大的社會代價。在摩多瓦的經濟生產活動當中農業的比重很大(三一·三%)，在工業部分則是以民生消費品的生產為主(占工業生產的四〇%)，能源則完全仰賴進口，傳統上對於其他蘇聯共和國的貿易依賴非常大。由於蘇聯貿易體系的崩解，進口能源費用的高漲，再加上一九九二年前所未有的旱災，使得摩多瓦的經濟受到非常沈重的打擊。戚西諾抗衡莫斯科和不參加獨立國協的政策更增加了經濟調整的困難。尤其是外德涅斯特的戰事消耗了大量的國家資源，而在莫斯科的支持之下，史米爾諾夫堅持對摩多瓦採取強硬路線。在一九九二年摩多瓦的農業生產下跌了五九·六%，工業也減產了二九·五%，GDP 則減少了二九·三%。^⑮由於央行濫發通貨以支撐無效率的國營企業，所以造成當年一、二七六%的惡性通貨膨脹。此種經濟危機促使摩多瓦政府在一九九三年年底開始推動大幅度的經濟改革，用高利率政策和發行公債來緊縮通貨，同時減少對於國營企業的補貼。另一方面，政府也全力維護新貨幣雷伊(lei)的匯率。由於戚西諾展現了全力推動經濟改革的決心，所以摩多瓦成為在前蘇聯共和國當中第一個獲得世界銀行貸款的國家。^⑯緊縮性的經濟政策固然在遏制通貨膨脹方面有其效果，使得物價上漲率在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下跌到八三七%和一〇八%，但是卻造成經濟的持續萎縮。摩多瓦的GDP在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分別下跌了八·七%和二二%，使得民生益發艱困，而執政的民族主義黨派遂首當其衝，為選民所排斥。在一九九四年二月的國會選舉當中，主張親俄的農民民主黨和社會黨掌握了全部一〇四席中的八十四席，摩多瓦的對俄政策遂開始轉向。^⑰

摩多瓦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六日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是否要和羅馬尼亞合併，結果七五·一%的選民主張維持現狀，反對合併。於是戚西諾和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註^⑭ Dan Ionescu and Stefan Krause, "Southeastern Europe Remains Wary," *Transition*, Vol. 2, No. 2 3 (November 15, 1996), pp. 23~25.

註^⑮ EIU Country Profile : Belarus & Moldova, 1995~1996, pp. 37~38.

註^⑯ EIU Country Profile : Belarus & Moldova, 1995~1996, p.49.

註^⑰ Rudolf A. Mark, "Progress Amid Crisis," *Transition : 1994 in Review*, Part II (February 1995), pp. 57~59.

的關係降到谷底，而莫斯科方面則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四月八日國會通過了加入獨立國協案，進一步表現了和俄羅斯修好的態度。接下來戚西諾又接受了歐安會議和俄羅斯的調解，與外德涅斯特的代表談判，並且發表聯合聲明，同意給予外德涅斯特特殊地位。^⑩在六月時，國會又修改了語言法，緩和了非羅馬尼亞裔對政府推行摩多瓦化政策的憂慮。^⑪在八月時戚西諾和莫斯科達成協議，決定第十四軍逐漸撤出外德涅斯特。到了年底，國會又給予南方噶噶烏斯（Gagauz）少數民族廣泛的自治權，藉以打消他們爭取獨立的念頭。凡此種種，都是一反過去民族主義當道時抗衡莫斯科和壓制少數民族的政策，顯示了戚西諾全盤調整了對俄關係。

在國會大選後，由宋加里（Andrei Sangheli）所領導的政府繼續推行經濟改革，^⑫同時努力改善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解決外德涅斯特的爭端，結果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摩多瓦的經濟開始好轉。當年的經濟衰退只有三%，而通貨膨脹則控制在二三·八%的水準。在一九九六年九月，莫斯科答應將摩多瓦所積欠的一億一千六百萬美元的債務展延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償還。而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的總統選舉當中，前共黨第一書記盧辛斯奇（Petru Lucinschi）擊敗了現任的斯內古總統，明白宣示要藉著自己和俄羅斯領導人之間的關係來促進摩多瓦的利益，更顯示出親俄羅斯力量的壯大，而戚西諾對莫斯科的扈從政策也就更加清晰了。^⑬

（二）白俄羅斯

如同摩多瓦一樣，白俄羅斯在獨立之初民族主義一時昂揚，但是由於經濟持續衰

^{註⑩} 在戚西諾的對俄政策轉向之後，莫斯科對於外德涅斯特的支持立刻減少。外德涅斯特的共黨領導階層在一九九〇年就宣布成立獨立的共和國，利用當地居民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來維持自身的地位。但是他們的政治態度是傾向於蘇聯共黨而反對葉爾欽的。在一九九一年的八月政變和一九九三年的十月政變當中，外德涅斯特都支持共黨保守派的勢力，而為葉爾欽所不喜，甚至駐防當地俄羅斯第十四軍的司令雷貝德（Aleksandr Lebed）也對外德涅斯特的共黨政客多所抨擊。因此在戚西諾對俄政策改變之後，莫斯科就迫使外德涅斯特和摩多瓦談判。然而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國會大選之後，葉爾欽為了拉攏民族主義力量，又改對外德涅斯特採取了籠絡的態度。參見 Charles King, “Moldova with a Russian Face,” *Foreign Policy*, No. 97 (Winter 94/95), pp. 106~120.

^{註⑪} 摩多瓦在一九八九年通過了前蘇聯共和國中第一個語言法，規定羅馬尼亞文是官方語言，排除了俄語的地位。參見 Daria Fane, “Moldova: Breaking Loose from Moscow,”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2.

^{註⑫} 民主農民黨雖然在選前承諾要減緩經濟改革的步調，但是實際上繼續了原政府的震盪治療。參見 *The Economist*, August 26, 1995, pp. 43~45.

^{註⑬} 第一輪的總統選舉投票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舉行，結果現任總統斯內古獲得三八·八%的選票，而他最強的競爭對手國會議長盧辛斯奇獲得二七·七%的選票。然而在第二輪的投票當中，盧辛斯奇卻以五四%比四六%的懸殊差距擊敗了斯內古，成為第二任的摩多瓦總統。盧辛斯奇曾任摩多瓦共黨第一書記、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摩多瓦駐莫斯科大使。在進入國會後，從一九九三年二月開始擔任議長。他此次競選總統是以獨立派人士的身份出現，但實際上是獲得了前共黨力量的支持。參見 Dan Ionescu, “Former Senior Soviet Apparatchik Becomes Moldova's President,” *OMRI Analytical Brief* (on Internet), Vol. 1, No. 500 (December 3, 1996).

敗，復得不到西方的充分支援，所以在一九九四年領導階層產生了重大的變動，明斯克的對俄政策也產生了巨大的轉折。這是一個典型的處於中等發展階段的前蘇聯共和國，將其對莫斯科的態度由抗衡轉移到扈從的例子。

白俄羅斯在蘇聯解體的過程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俄羅斯的總統葉爾欽、烏克蘭的總統克拉夫邱克（Leonid Kravchuk）、以及白俄羅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舒斯凱維支（Stanislau Shushkevich）就是在白俄羅斯的白拉維沙（Belavezha）宣布蘇聯解體，成立了獨立國協。這個協議反映了當時白俄羅斯希望能脫離莫斯科掌握的心態。舒斯凱維支是一個白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他拒絕簽署獨立國協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在塔什干所通過的集體安全條約，結果引來總理科必奇（Vyacheslav Kebich）的反對和國會的彈劾，但是舒斯凱維支仍然不為所動。

舒斯凱維支抗衡莫斯科的政策並不能夠持久，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白俄羅斯的進出口當中俄羅斯就占了五〇%到六〇%，而能源更有九〇%需要靠俄羅斯供應。在蘇聯解體前，莫斯科開始要求它的能源客戶依世界市場價格以硬貨幣付費。由於支付不出款項，白俄羅斯對俄羅斯積欠了十二億美金的債務，而且還導致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幾度瓦斯停止供應。除了能源危機之外，白俄羅斯的經濟也在一九九三年出現嚴重的問題。科必奇政府在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二年間盡全力管制價格，維護國有企業，防止社會因為蘇聯的解體而出現不安，所以這兩年白俄羅斯的經濟衰退並不嚴重，通貨膨脹也比其他的前蘇聯共和國溫和。[◎]這樣推遲經濟改革的結果並不能夠真正地解決問題，所以從一九九三年開始白俄羅斯的經濟開始顯露危機。GDP在一九九一和一九九二年下跌了一·二%和九·六%，到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更跌到一一·六%與二二%。在通貨膨脹方面，一九九一和一九九二年分別是八四%和九六九%，到了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更飆漲到一、一八八%與二、二二〇%（參見本文上篇表五）。社會騷動不安，對領導階層的信心大失。

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國會議員魯卡申科主持的反腐敗委員會指控國會主席舒斯凱維支及總理科必奇貪污，要求二人下台。[◎]到了一九九四年一月，國會以二〇九對三六票表明對舒斯凱維支的不信任，並將其罷免，科必奇則通過了信任投票。在一月到七月總統大選之間，科必奇總攬政務，明斯克的對俄關係開始好轉。到了七月魯卡申科以八一·一%的高票擊敗了科必奇，贏得了總統直選，更進一步推動和俄羅斯合併。科必奇和魯卡申科都希望藉著對莫斯科給予政治讓步來換取經濟支援。[◎]所以在四月明斯克和莫斯科簽訂了貨幣同盟，白俄羅斯讓俄羅斯控制自己的貨幣政策，並且允許俄軍在本國駐防，以換取莫斯科同意減免白俄羅斯所積欠的債務，並且讓兩國的盧布以一比一的比例交換。到了一九九五年二月，魯卡申科敦促葉爾欽同意和白俄羅

註◎ EIU *Country Profile : Belarus & Moldova*, 1995~1996, p. 9.

註◎ 關於魯卡申科民粹主義的政治作風以及他的個人經歷，參見 Ustina Markus, "Still Coming to Terms with Independence," *Transition : 1994 in Review, Part II* (February 1995), pp. 47~52.

註◎ Ustina Markus, "Imperial Understretch : Belarus's Union with Russia," *Current History*, Vol. 95, No. 603 (October 1996), p. 335.

斯結成關稅同盟，兩國開放邊界，俄軍可無償駐防。在五月的時候，魯卡申科透過國會選舉和公民投票，獲得民衆的支持，繼續推動和俄羅斯的整合。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俄國杜馬選舉，共黨獲得勝利，葉爾欽在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告急，必須拉攏民族主義的選票，魯卡申科就更全力推動俄、白聯合。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魯卡申科聲稱俄羅斯取消了白俄羅斯所積欠的十二億七千萬美金的債務，而白俄羅斯也不向莫斯科要索駐軍費和撤除核武的費用。到了三月二十九日，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簽訂了關稅同盟條約。^⑩在四月二日，葉爾欽和魯卡申科更簽署了共同體條約（Treaty on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⑪決定兩國設立一個類似歐洲聯盟的共同體，成立最高委員會，主席由兩國輪值，一次兩年。^⑫這樣的組織是莫斯科實際上不可能接受的，但是葉爾欽爲了勝選，不惜以此造勢，表示他有重建蘇聯時代莫斯科勢力範圍的能力。^⑬然而到了葉爾欽當選總統之後，俄、白聯合的動作又緩慢下來。魯卡申科由於面對國會的掣肘，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再度舉行公投，通過新憲法以擴張總統權力，並且依然矢志推動和俄羅斯的聯合。^⑭

由於白俄羅斯沒有經濟改革政策，只有藉著和俄羅斯聯合來挽救經濟危機的企圖，^⑮所以在絕大部分前蘇聯共和國渡過了經改最困難的階段，逐漸開始恢復成長之後，白俄羅斯的經濟危機才方興未艾。然而逐漸惡化的經濟危機又更增強了魯卡申科總統和俄羅斯合併以解決經濟問題的動機。結果白俄羅斯的經濟愈惡化，明斯克愈親俄，甚至到了俄羅斯本身也不願意接受的地步。^⑯然而俄羅斯本身的政治環境又給予魯卡申科推動俄、白合併的機會。這種獨特的態勢，在白俄羅斯的經濟沒有破產之前恐仍將持續。

(三)烏克蘭

烏克蘭是前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當中的第二大國。它的人口占蘇聯的一八%，農業生產占二二·三%，消費品生產占一八·二%，總體的國民生產毛額占二五%到三

註^⑩ 參見 *Izvestia*, March 28, 1996.

註^⑪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所建立的是「共同體」(soobshchestvo)；關於條約的具體內容，參見 Peter Rutland, “Belarus Merging with Russia,” *OMRI Analytical Brief* (on Internet), Vol. 1, No. 46 (March 29, 1996).

註^⑫ Ustina Markus, “Imperial Understretch: Belarus’s Union with Russia,” p. 336.

註^⑬ *The Economist*, August 10, 1996, p. 36.

註^⑭ 新憲法規定國會將由一院改爲兩院，上院有三分之一的成員由總統指定，總統的任期延長爲七年，憲法法庭的大法官多數將由總統派任，總統並有權力解散國會。參見 Ustina Markus, “The Belarusian Referendum Results,” *OMRI Analytical Brief* (on Internet), Vol. 1, No. 495 (November 26, 1996).

註^⑮ Ustina Markus, “Imperial Understretch: Belarus’s Union with Russia,” p. 337.

註^⑯ 在一九九三年俄羅斯國會大選之後，主掌經改的第一副總理蓋達(Yegor Gaidar)和財政部長費多羅夫(Boris Fedorov)雙雙去職，原因之一就是葉爾欽答應要和白俄羅斯結成經濟聯盟，而這會嚴重地損害俄羅斯的經濟利益。

○%。就軍事力量而言，烏克蘭的戰略核武占蘇聯總數的一四%，戰術核武占一八%，也就是繼美國和俄羅斯之後的世界第三大核武國家。烏克蘭的首府基輔是俄羅斯文化的濫觴之所，古俄羅斯文明的薈萃之處。在歷史上，烏克蘭在莫斯科被蒙古人統治的時候是立陶宛的一部分，後來又成為波蘭的領土，比較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東烏克蘭在十七世紀中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但是西烏克蘭卻繼續在波蘭和立陶宛的統治下渡過了一世紀。這個分離的經驗為東西烏克蘭帶來了不同的集體記憶。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九年西烏克蘭又劃歸波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重新落入莫斯科的掌握，同時東烏克蘭受到史達林強制集體化的蹂躪，痛深創劇。^⑩這些因素使得烏克蘭的民族主義相當昂揚，在蘇聯的中央統治權威逐漸瓦解的時候，基輔很自然地出現了要求獨立的呼聲。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烏克蘭公民投票的結果贊成脫離蘇聯獨立。接下來烏克蘭的總統克拉夫區克就和俄羅斯的葉爾欽與白俄羅斯的舒斯凱維支在白拉維沙簽訂了終止蘇聯的協議。顯然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和獨立運動對於蘇聯最後的崩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獨立後的烏克蘭仍然希望能夠脫離莫斯科的掌握，所以克拉夫區克的對俄政策是以抗衡為主。^⑪在黑海艦隊的分割方式上，基輔與莫斯科相持不下；在烏克蘭核子武力的處置方式上，雙方屢有爭執；在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地位和西瓦斯托堡海軍基地的歸屬問題上，俄、烏二國之間也出現了劇烈的摩擦。當一九九二年一月俄羅斯開始「震盪療法」的經濟改革之後，烏克蘭被迫跟進，大為所苦。因此在當年就決定退出盧布區，建立本國的貨幣自主。所以在經濟改革上，莫斯科和基輔也是南轅北轍。歷史的傷痕和現實利害關係的衝突使得烏克蘭不斷挑戰俄羅斯在獨立國協當中的領導地位。克拉夫區克政府的這些舉動也獲得了烏克蘭國內民族主義者的支持。^⑫

烏克蘭的經濟狀況在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年持續惡化。GDP下降了一三·七%和一七%，通貨膨脹率則上升到一、四四五%和五、五〇〇%。^⑬造成這個經濟困局的原因包括惡劣的天候、車諾比（Chernobyl）事件對於農業的後續影響、傳統市場的喪失、經濟轉型的衝擊和俄羅斯要求提高能源價格。其中尤以後者的影響最大。在經濟衰敗、物價沸騰的情況之下，烏克蘭的煤礦工人在一九九三年六月舉行大罷工，對當局帶來極大的壓力。^⑭除了經濟的困局之外，烏克蘭還為了核武問題遭受到華盛頓的巨大壓力。在蘇聯崩解之初，美國就為了擔心和前蘇聯所簽訂的限武條約無法履行

^{註⑩} 關於烏克蘭的歷史背景和與俄羅斯之間的歷史關係，參見趙威，「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四卷第一期，民國八十四年一月，頁一九～三一。

^{註⑪} 抗衡莫斯科的政策一則是基於民族主義的考慮，一則是為了動員國內的支持，或是為了避免被民族主義者攻擊為通俄。參見 Eugene B. Rumer, "Eurasia Letter: Will Ukraine Return to Russia?" *Foreign Policy*, No. 96 (Fall 1994), p. 135.

^{註⑫} 最有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政黨就是魯赫（Rukh）。

^{註⑬} *EIU Country Profile: Ukraine*, 1996~1997, p. 16.

^{註⑭} Ustina Markus, "Stability amid Political Turnover," *Transition: 1994 in Review, Part II* (February 1995), p. 66.

，而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與哈薩克等四個擁有蘇聯核武的國家舉行會談，希望各國能將核武集中到俄羅斯銷毀。克拉夫區克曾經為了爭取世界各國的承認和支持而答應美國的主張。但是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烏克蘭的國會因為有感於西方並沒有為其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而不願意放棄核子武器，聲稱境內的核武均為烏克蘭的財產。^⑩在十一月，國會雖然通過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核子武器條約（START-1），但是附帶了許多條件，使得華盛頓大為反感，不惜和莫斯科聯手來壓迫烏克蘭遵循前議。對西方國家而言，烏克蘭的安全並非重要的考慮因素；如何促使烏克蘭信守承諾交出核子武器才是關切的重點。^⑪西方尤其不願意為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爭端而和莫斯科決裂。^⑫整體來說，在基輔抗衡莫斯科的戰略當中，最重要的兩個要項就是富國強兵和爭取西方的支持。結果在獨立兩年後，經濟加速衰敗，能源供應又為俄羅斯所制，富國的目標並不能達成。在另一方面，想要維持核子武力以加強嚇阻力量又和交好美國的戰略目標衝突。基輔對莫斯科的對抗政策因之面臨了無以為繼的局面。

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烏克蘭的國會改選，以共黨為主的左派占據大多數席位。到了六月總統大選的時候，克拉夫區克面臨總理庫其馬（Leonid Kuchma）的挑戰。這一場總統選戰的關鍵議題就是烏克蘭的對俄態度。克拉夫區克極力倡導民族主義，主張繼續抗衡莫斯科，而庫其馬則主張和俄羅斯合作並推動經濟改革，結果庫其馬獲得勝利。雖然東西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不同態度在此次選舉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克拉夫區克的主要票源在民族主義昂揚的西烏克蘭，而庫其馬則在東部和南部獲得較多數的支持），^⑬但是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還是克拉夫區克從獨立以來抗衡莫斯科的政策和經濟上的保守路線為烏克蘭帶來巨大的社會代價。結果一九九四年的國會和總統大選改變了基輔對於莫斯科的基本路線。

烏克蘭在一九九四年初通過了START-1，在年底又通過了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也就是屈從在西方和俄羅斯的聯手壓力之下，放棄了用核武來嚇阻莫斯科的戰略目標。在基輔和莫斯科改善關係之後，黑海艦隊和克里米亞半島的問題也獲得部分的解決。在一九九五年六月庫其馬與葉爾欽簽訂了分割黑海艦隊的協議，另一方面莫斯科對於克里米亞要求獨立和回歸俄羅斯的運動也視為烏克蘭的內政，不加以干涉。^⑭由於經濟改革的進度緩慢，兩國關係的改善對於烏克蘭的經濟僅帶來有限的幫助。在一九九四年烏克蘭的GDP下跌了二四·三%，到了一九九五年跌幅減少到一一·八%；通貨膨脹則由八九一%下降到三七五%。仍然嚴重的經濟問題促使烏克蘭繼續

註^⑩ EIU *Country Profile : Ukraine*, 1996~1997, p. 9.

註^⑪ 參見趙威，「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頁二九。

註^⑫ 參見 Robert B. Cullen, "Ukraine, Ukrainian Minorities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The Atlantic Council Occasional Paper*, July 1994.

註^⑬ Eugene B. Rumer, "Eurasia Letter : Will Ukraine Return to Russia ?" p. 133.

註^⑭ 親俄羅斯的米什可夫（Yuri Meshkov）在一九九四年一月贏得克里米亞的總統選舉，兩個月後親俄派也掌控了克里米亞議會。此後克里米亞為了是否獨立和烏克蘭衝突不斷，但是俄羅斯一直視為烏克蘭的內政。克里米亞的居民大多是俄裔，該地區是在一九五四年由赫魯雪夫從俄羅斯割歸烏克蘭，以慶祝一六五四年俄烏聯合三百年的紀念。

依賴俄羅斯。雖然庫其馬對莫斯科仍然存有疑慮，@但是新政府已經不再採用抗衡的政策（不論是維持核武力或是拉攏西方），而逐漸認可俄羅斯在前蘇聯共和國當中的領導地位。這個政策轉折是由結構性的因素所造成的，因此雖然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分子在主觀上有抗衡莫斯科的意願，但是基輔的政府在現實條件的拘束下還是只有逐漸接受扈從的角色。

伍、和兩岸關係的比較

在檢視了前蘇聯十四個共和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之後，我們發現了以下的幾項結論。第一，在莫斯科的強勢態度之下，各國只能在抗衡和扈從之間做一選擇。抗衡是不願意接受俄羅斯的優勢支配地位，而欲以提升國力或尋求外援來對抗從莫斯科所傳來的壓力。扈從則是接受俄羅斯的主導地位，從而調整本國的外交、國防和經濟政策，以配合莫斯科的偏好。前者是使強鄰不能侵犯本國的利益，後者是使強鄰不欲侵犯本國的利益。相互對等的關係在此不可能存在，因為強國的基本態度已經將其排除在外。俄羅斯由於是各國歷史上的統治者，在國力上占有無可置疑的優勢，所以很自然地視近鄰國家為本國的勢力範圍，對各國都提出了準主權的要求（例如駐軍、要求給予俄裔雙重國籍等）。面對此種情勢，各國只有在順從和抗拒之間做一選擇。因此大如烏克蘭，小如愛沙尼亞，都不能和俄羅斯發展平等的關係。

這個狀況和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很類似。雖然台灣長期以來都希望能以對等政治實體的身份和中國大陸建立關係，但是北京卻只願意以由上對下的態度來對待台北。造成此一態度的最大原因就是兩岸國力的差距過大，同時北京以中國的合法政府自居，將台灣視為邊陲省分，在心態上就有上下之分。中國大陸的此種認知和俄羅斯並無二致。對照前蘇聯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在此其實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抗衡，就是不接受中國大陸的優勢支配地位，而以提升國力或尋求外援來對抗從北京所傳來的壓力。第二是扈從，也就是接受中國大陸的主導地位，從而調整本身的外交、國防和經濟政策，以配合北京的偏好。前者是使中國大陸不能侵犯台灣的利益，後者是使中國大陸不欲侵犯台灣的利益。像前蘇聯各國和莫斯科之間的情形一樣，在兩岸之間相互對等的關係不可能存在，因為中國大陸的基本態度已經將其排除在外了。

我們的第二個觀察是，經濟發展程度的差距對各國的俄羅斯政策產生了相當決定性的影響。在前蘇聯的四組國家當中，波海三國的經濟發展程度超越俄羅斯，而中亞五國則明顯地落後。這個經濟發展的格局決定了二者對待莫斯科的基本態度：波海三國採取抗衡政策，而中亞五國則採取扈從政策。這種區域的基本政策取向不論在獨立

註@ 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庫其馬以阻撓經濟改革為名，開革了他的總理馬楚克（Yevhen Marchuk）。馬楚克是烏克蘭的安全首腦，他從一九九五年六月開始擔任總理的職位，努力擴張自己的勢力。在他被開革前一個星期，馬楚克和俄羅斯總理契爾諾梅爾金（Viktor Chernomyrdin）秘密會晤，咸信這是他被解職的最重要因素。CNN Interactive (on Internet), May 27, 1996.

前或是在獨立後都是一致的，也就是波海國家在蘇聯崩解前激烈地要求獨立，在蘇聯崩解後也一直以厲行經濟改革和爭取西方支持來對抗俄羅斯的壓力；而中亞國家在蘇聯崩解之前就缺乏獨立的意願，在蘇聯崩解之後也還是願意尊重莫斯科的主導地位，將本國的外交、國防和經濟政策和俄羅斯配合。這種令人驚異的一致性只有在兩個區域相差懸殊的經濟發展程度當中才能夠找到適當的解釋。

如果經濟發展程度是決定各國對待莫斯科基本態度的主要決定因素，那麼在前蘇聯共和國當中經濟發展程度居於波海和中亞兩區之間的西部三國和外高加索地區就應該有介於抗衡和扈從之間的對俄政策，而事實也正好是如此。這些國家絕大部分都曾掀起高昂的民族主義運動，在波海三國之後積極地要求從蘇聯脫離。然而經濟的困局和西方的支持不力使得它們逐一重新返回莫斯科的勢力範圍，也就是它們的對俄政策從抗衡轉向扈從。我們並且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各國對俄政策轉向的時間有相當的一致性，並且大部分都伴隨著領導階層的改變。這兩個地區的政策轉向都發生在一九九三年（外高加索）和一九九四年（西區三國），也就是前民族主義領袖的抗衡政策已經為各國帶來重大的損失之後。就領導階層的改變而言，在外高加索地區是前蘇聯的共黨官員返國取代民族主義的領袖（在喬治亞是謝瓦納澤取代岡薩胡吉亞，在亞賽拜然則是阿里耶夫取代埃爾齊拜），然後轉變各國的對俄政策；而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則是親俄派的共黨官僚取代領導國家獨立的民族主義政客（魯卡申科取代了舒斯凱維支，庫其馬取代了克拉夫區克），而後由抗衡轉向扈從。^⑩

同樣從經濟發展程度上來看，台灣和大陸之間的差距遠大於波海三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差距。如果依照各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來推論（即本身的經濟發展程度愈高於強鄰，則愈採取抗衡政策；本身的經濟發展程度愈低於強鄰，則愈採取扈從政策），則台北應該會採取強力的抗衡政策，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此我們必須釐清一個概念，就是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濟依賴不是一件事。在前蘇聯各共和國之間經濟依賴的程度都非常高，而且彼此互相貼補的情況也非常普遍。一般而言，各國在能源的供應和本國產品的市場上都相當依靠俄羅斯。然而在經濟上依賴俄羅斯的程度和各國採取抗衡或扈從政策之間沒有任何相關。盛產石油的亞賽拜然和盛產天然氣的土庫曼是能源輸出國，而波海三國的能源則完全依靠俄羅斯供應，然而亞賽拜然與土庫曼卻是扈從者，而波海國家則是抗衡者。當然經濟依賴可以被俄羅斯或任何大國當作籌碼來迫使小國就範，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係當中我們就看到這個工具被使用到極致。但是對於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小國而言，由於生產技術和產業組織都較為成熟，本國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較強，因此轉移貿易夥伴以減少依賴的能力也較大。從蘇聯解體以後，在

註⑩ 和喬治亞與亞賽拜然比較起來，亞美尼亞的政策轉向較為不清楚，原因是在納卡爭端中亞美尼亞需要俄羅斯的支持，所以在獨立後傑彼得森很快就向莫斯科一邊倒。然而在蘇聯統治末期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旺盛，從蘇聯脫離獨立的慾望也非常強烈，只不過葉里溫的對俄政策轉向發生的較早，同時沒有伴隨著領導階層的更替。

註⑪ 摩多瓦的政策轉向也是發生在一九九四年，不過當時主要的領導階層轉變是國會的改選，而沒有總統的變動。這和摩多瓦的總統不像其他的獨立國協國家一樣強勢有很大的關係。

轉移貿易方向上做得最成功的就是波海三國。如果把同在以前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東歐國家也計算在內，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的國家轉移市場和原料依賴的能力就越強。台灣由於成功地累積了長期的經濟發展經驗，早已融入世界市場，因此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雖然逐漸增加，但是並不曾因而改變對北京的政策。反而由於憂慮一朝會被經濟勒索，因此一方面提出「南向政策」與「戒急用忍」，一方面更加緊增强國力，尋求外援，以抗衡北京。

然而就長期的發展趨勢來看，台灣和中國大陸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差距會明顯減少。如果從前蘇聯的例子來看，這就代表著台北的抗衡策略有可能向扈從方面移轉。不過在這個趨勢還沒有十分明顯之前，經濟發展程度的差距仍然會是增强台北抗衡北京的誘因。

在討論權力不對等和主權衝突的大、小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時，除了經濟發展程度的差距之外，另外一個主要的因素就是外援的有無。在前蘇聯的共和國當中，由於地緣、文化和種族等的淵源，常和鄰近的國家有密切的關係。例如愛沙尼亞與芬蘭、拉脫維亞與瑞典、立陶宛與波蘭、摩多瓦與羅馬尼亞、中亞的回教國家和土耳其與伊朗等。然而這些鄰近國家通常都沒有辦法提供各國抗衡莫斯科的有效援助。由於俄羅斯是世界強權，能夠幫助各國對抗莫斯科壓力的只有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然而西方在各國的利益有限，結果除了波海三國由於在地理和文化上和西歐親近因此獨獲青睞外，其餘的前蘇聯國家都沒有辦法從西方獲得任何有力的支持。這個推論也可以延展到東歐地區。在那裡，北三國的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由於是傳統中歐的一部分，因此獲得西方世界的認可，有能力抗衡莫斯科；^⑩至於南方的巴爾幹半島則又被摒除在西方的關切之外（唯一的例外是前南斯拉夫諸國當中和奧地利、匈牙利與德國關係最深的斯洛文尼亞）。由於西方對大部分的前蘇聯國家並沒有真正的關切和承諾，因此各國希望運用西方力量來對抗莫斯科的企圖也常歸於失敗，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烏克蘭的克拉夫區克，而喬治亞的謝瓦那澤想運用他在擔任前蘇聯外長時所累積的影響力，或是亞賽拜然的埃爾齊拜想要依靠有西方支持的土耳其來對抗莫斯科，結果也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西方並不是和俄羅斯沒有衝突，只是不願意為了這些前蘇聯共和國而和莫斯科攤牌。

台灣的情況比較接近波海三國。由於中華民國從二次大戰之後就在美國的羽翼之下成長，所以可說是美國傳統勢力範圍的一部分，因此台灣在西方有其依恃。台灣的地理位置又使其和日韓與整個亞太地區的利益連繫在一起，所以站在美國的觀點，台灣的安全值得防護，這個態勢在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時可以看得很清楚。然而美國在台灣的利益並不足以和美國在中國大陸上的利益抗衡，所以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有限的。不過台灣近來的政治改革拉大了和大陸之間的制度差距，也累積了動員西方理想主義支持的資本，而這是環俄羅斯各國所沒有的優勢。由於台灣在相當程度上有西方可倚仗，所以台北對於北京的抗衡政策也因之而加強。

^⑩ 斯洛伐克的地位有一些模糊，因為它是從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分出，被認為是較不西化和落後的國家。

我們對俄羅斯與其周邊國家關係的最後一個觀察是由於抗衡和扈從都會帶來很大的代價，所以並沒有哪一項政策是巴瑞圖優越（Pareto superior）的。既然如此，在各國都可以找到支持或反對各別政策的政治勢力。事實上就是這些政治勢力將經濟發展的程度和西方支持的大小這兩項結構性的因素展現出來。從前蘇聯各國的例子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結構性的因素常是透過對於民眾切身生活的影響，從而改變各個政治勢力之間的平衡，最後透過選舉或是其他的機制來轉變領導階層，最後促成對俄政策的轉變。一般而言，站在抗衡俄羅斯立場的或是民族主義黨派、或是知識分子的團體、或是機會主義政客所成立的政黨，希望藉著民眾反俄的情緒來爭取選票。站在扈從莫斯科立場的或是原共黨、或是其他左派政黨、或是俄裔組成的政治團體、或是行政領袖為了選舉而成立的黨派。這兩種政治團體不論其根源是族群、地域、階級、或是附屬於特定政治領袖，都以對俄關係作為主要的政綱，許多選舉也是以對俄關係作為最主要的議題。

在台灣，國民黨、民進黨和新黨主要所代表的社會分歧不是階級，而是統獨，也就是對中國大陸的政策，這個情況和前蘇聯各國的政黨以對俄政策作為主要的區分因素頗為相似。在三黨之中，民進黨所主張的台灣獨立和北京的觀點直接衝突，因此民進黨傾向於增強國力、聯合國際上的力量以抗衡中國大陸。新黨承襲了傳統的國民黨理念，主張中國統一；在現階段則贊成和北京維持良好的關係，反對聯合美國或日本的力量來制衡中共，因此和扈從的立場接近。至於執政的國民黨則在抗衡－扈從的光譜上居於民、新兩黨之間，但是在實務上則偏向於抗衡，也就是為了增強抗拒北京的力量，不惜在國際上爭取外援，觸怒中共。抗衡－扈從的政策選擇在台灣是理解為外交政策和兩岸關係孰重為主。如果全力發展外交關係，推動進入聯合國，向國外購買先進的武器設備，而在兩岸關係上則加以約束限制，則便是抗衡政策。如果以兩岸關係為重，不在外交和國際場合挑戰中共，謹守一個中國的政策底線，壓制台獨活動，希望以此達到兩岸休兵，則明顯的是扈從政策。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程度和美國的支持仍然對台北採取抗衡政策相當有利，所以台灣的大陸政策其實是以抗衡為主。對執政者而言，或許並沒有抗衡的意圖，而只是尋求對等的關係，但是由於北京的優勢地位和中心心態，拒絕從屬就必須抗拒中共的壓力，結果還是落入抗衡的選擇。

從俄羅斯與近鄰國家的關係來觀察，我們發現對強權的鄰國而言，抗衡和扈從是僅有的選擇，對等關係不可能存在；決定各國選擇抗衡或扈從對俄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二者的經濟發展程度的差距，即本身的經濟發展程度愈高於強鄰，則愈採取抗衡政策，而本身的經濟發展程度愈低於強鄰，則愈採取扈從政策；在經濟發展差距不明顯的場合，外援的有無便成為決定小國政策最重要的因素，凡愈能得到西方支持的國家，就愈能抗衡莫斯科；最後是各國對俄政策的轉變是透過主張抗衡和主張扈從的政治團體之間的政治角力與領導階層的轉變來達成。將俄羅斯和其近鄰的關係與兩岸關係相比較的結果，我們發現這四點結論也同樣可以適用。

本文採用類推模式來建立分析兩岸關係的新架構。類推模式的主要著眼點是在具

有相同結構的兩群關係當中應可發現共同適用的規律。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自然和俄羅斯與其近鄰的關係不完全相同，然而只要其相似性足夠支撑共同的規律就足以展現類推模式的效力。本文只是作者試圖為兩岸關係建構一個類推模式的初步嘗試，以後仍望能在經驗素材和理論發展上繼續充實。

*

*

*

